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貧而噬血的台灣新聞場域

「在您的電視開始播送節目時，靜靜坐在螢光幕前直至收播，您應該會同意，眼前是貧乏不毛的荒原大漠...。」以上是曾擔任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主席米諾（Newton Minow），於1961年對業者所發表的「荒原演講」，此次演講堪稱媒體批判的里程碑（馮建三，2005年10月9日）。四十年已過，美國電視發展如何，非本篇討論重點，重點在於經過四十年的台灣電視節目內容卻「追尋」著美國的腳步，走向貧瘠化，尤其是電視新聞頻道，看似蓬勃多元，卻僅是利用聳動誇大題材包裝毫無質感的內容，「新聞貧瘠化、惡質化」的結果，使得「罵媒體、罵電視」成為全名運動。新聞媒體從業人員的處境也從早期「無冕王」、「文化流氓」，演變為「無冕王8旦」、¹「腦殘妓者」，甚至連媒體工作者都自嘲變成「蛋白質」（笨蛋、白癡與神經質）。² 傳媒種種問題，閱聽眾將矛頭指向媒體工作者，而媒體工作者則推托是「收視率」惹的禍，真正的肇因為何？

是因為現今記者素質不良嗎？資深記者大嘆，新一代記者活在光鮮明亮的環境，不需擔憂莫名的文字獄、威權體制的桎梏，曲筆為文的時代已過，迎面而來應該是自由解放的氣息；前端種種障礙已隨時代變遷漸漸消失，為何新一代記者仍撞得頭破血流、喪失專業與尊嚴，僅存罵名？

新一代的記者大喊，資本主義利潤極大化的思維、廣告企業主襲捲而來的置入性行銷、政商無孔不入的干預，已經使得看似光鮮亮麗、擁有新聞自由、接近權力核心的這群媒體「新貴」，淪落到苦命的「廉價」勞工（甚至薪資與工作時數比，幾乎不到勞工最低薪資的標準）；在貧而嗜血的新聞場域圈裡，新一代記者在各方角力拉扯下，變得如循環熵的作用過程一般，整個新聞系統漸漸流失、變得被動（轉引自Merrill, 1996 / 周金福譯，2003），新聞內容趨向高度同質化、貧瘠化、廣告化。張耀仁（2002: 77）指出，雖各家新聞媒體在市場導向運作機制日益顯著下，如雨後春筍冒出，卻並未遵循著自由主義所奉行「獨占產生一致、競爭造成多元」的理念發展，反而產製出高同質性的新聞內容；多數研究發現，各台新聞報導的題材選擇內容雷同度甚高（陳馥綺，1992；許雅靜，1997；程宗明，1999；黃國棟，1999）。

¹ 參見楊兆景（2004）。《無冕王 8 旦：揭露台灣股市黑幕.投資理財不可不讀》。台北：酒客。

² 參見鄭淑敏（1999年12月1日）。〈正視 AC 尼爾森對台灣電視亂象的影響：中視董事長鄭淑敏的呼籲〉，《聯合晚報》，第 7 版（半版廣告，亦刊登於其他報紙）。

Bourdieu (1994; 林志明譯, 2002: 33) 爲此弔詭現象, 提出見解。新聞體系是一封閉且束縛強烈的場域, 場域內的產物-新聞, 屬於集體生產 (不僅是組織內同事, 更是同業間互動後共同生產), 透過場域內互相牽制的機製, 使得新聞產製如同互相反射的鏡像遊戲, 產生強大的封閉、意識禁錮效應。

Luhmann (2000 / 胡育祥、陳逸淳譯, 2006) 也以系統的概念, 解釋此惡果 (同質化), 並提出新聞產製的封閉性 (operational closure): 新聞媒介產業的運作, 除了以監看外在的社會環境, 勾勒出第一層真實環境, 更有從系統內成員間相互觀察、監視而形成的第二層現實; 後者所呈現的是新聞媒介組織爲了降低經營上與同業競爭的不確定感, 所內化的一項慣例, 這樣的慣例操作, 反而使得記者們將自我隔絕於整體社會環境外, 產生場域成員的集體行動。由於成員有著遭同業「獨漏」新聞的恐懼, 因此以相同且固定的新聞處理模式尋找消息來源、事件、採訪 (張文強, 2005), 最後, 形成相互牽制的新聞場域, 產生記者一窩蜂模仿跟隨的現象, 逐步走向「共同退化」。

第二節、研究動機

一、在別人救我們之前, 我們能否先自救! ?

既然在媒體場域內、外都已有人不滿現況 (惡劣的媒體環境), 當然就會有反動力量。首先在場域外有閱聽眾媒體公民運動, 由社區大學推廣, 讓民眾從日常生活改變與電視的關係, 包括解讀、批判電視, 進而改革電視亂象; 基此理念, 媒體素養課程於1999年應運而生; 再次, 社區大學推動「關 (電視) 機運動」, 擬定包括「關掉電視, 想想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媒體」等議題; 希冀可以從下而上, 藉由公眾的「微權力」 (micro politics), 集集体意識, 最後改變「鉅型的權力結構」 (macro power) (林麗雲, 2005年3月)。

然而, 如此作法似乎有些隔靴搔癢, 無法直搗媒體亂象核心, 媒體問題觀乎「內容」, 更觀乎產出該內容的結構, 「結構」確實是解決傳媒問題需關切的焦點, 因此媒體改革運動隨之而來, 有三退聯盟主張釋股、推動「黨政軍三退」, 有行動者主張建立「公廣集團」, 還權於民等改革政策, 希望藉由政府力量, 訂定法律程序、鬆動媒體結構, 並在最佳時機由外而內一次攻陷, 重整媒體失衡亂象。

改革媒體的外在兩波力量都已觸及, 也有許多相關文獻探討政府與閱聽人應如何抗衡這頭巨大的媒體猛獸, 那麼, 困在猛獸肚內的行動者呢? 當外在力量都在試圖改革媒體的同時, 身處在新聞場域記者, 其意識是否能被喚醒呢? 是否能在主流媒體內爭取突圍的空間? 難道真的毫無反叛空間? 是不爲? 亦不能爲?

「記者，你能不反抗嗎？」（林照真，2006）

因此，若要解決傳媒問題，應從內、從外，雙管齊下，才有可能處理媒介市場失靈問題。但這三面向（觀眾、政府、媒體）若皆要探討，並非一篇碩士論文可處理詳盡，該選取哪部分作為本篇探討主題？

筆者認為，「從外直擊」雖是可以打破媒體亂象的治本方式，不過一個結構本質的改變，需要許多相關人士，經由長時間持續努力，才會有些許成績，光是「三退運動」，從1995年提出至2006年，花了11年的時間才完成部分目標（股權釋出）；為何不直搗黃龍，從個人認知層級出發，探討新聞產製過程中，記者與場域行動者（同事、同業、主管）互動時的內在動機與思考過程，剖析場域內的行動者，是否有「主動」的抵抗意識？由內而外，阻止記者們「共同退化」，而非「被動」等待奧援、等待媒體本質結構的改變？「在別人救我們之前，我們能否先自救！？」

二、特重「重大社會事件」採訪報導

2006年4月1日晚間6點02分於台東發生規模6.4地震，筆者當時位於A台南部新聞中心，目睹了一場A台記者與TVBS的合作關係。³

地震來臨時，A1記者正在辦公桌前，利用MSN與友台記者閒話家常...，突然之間天搖地動，A1記者大喊，是不是地震？此時A1記者的MSN丟來許多友台記者詢問有關地震的訊息。接著，晃動的更厲害了，大家發現狀態不對，準備奪門而出；A2記者往門口方向奔跑時，不忘轉開電視，觀看其他台是否已播報地震的相關新聞，並撥電詢問同業目前最新情形為何？震央在哪裡？高雄是否有災情傳出？而A3記者則接到TVBS記者告知地震最新訊息，並回報給當日值班主管：「有民眾打電話至TVBS，聽說衛武營圍牆倒塌...」，不到一分鐘，B台新聞畫面出現新聞快報：「據傳高雄衛武營圍牆倒塌?!」於是A台值班主管打電話請仍在外跑新聞的A4記者察看衛武營現場狀況為何。15分鐘過後，A4記者回報：「僅部分圍牆碎片剝落...」（田野筆記，2006年4月1日）。

上述突發事件，隱含了速度追求的極致，筆者除了對TVBS幾乎做到同步連線感到訝異，也對記者查證的過程與獲取消息之管道，感到好奇與不解。在新聞場域內，各方的合作關係，與隱藏在合作下對於「速度」的競爭方式，其程度都遠高於我們所想像。

本研究將範圍拉廣至「重大社會新聞事件」，記者們要面臨不僅是如「突發事件」處於一個資訊不明確的狀態，更有著時間的急迫性（搶先播出、或爭取獨家），以及一場馬拉松式的長期抗戰（新聞訊息的持續追蹤）；在這種隨時備戰

³ 為了保護消息來源，本文特以英文字母代替原名。

的採訪氛圍下，記者遊走在理性與非理性的邊緣，或許，「一窩蜂」現象，就是其遊走下的必然結果。

綜上所述，新聞場域間的集體性、封閉性使得記者產製出同質性甚高的新聞，不過，在市場競爭機制的壓力以及對於「平凡中的不平凡」（Bourdieu, 1994 / 林志明譯，2002: 26）之追求，記者更必須在高同質產物中，尋求異質，也就是「獨家」；然而，在「獨家」的追逐戰中，反而使其深陷於更強烈的束縛。

「獨家」追求的實踐則從先馳得點—「速度」之競逐而來，「速度」追求的極致是「同步」轉播，為的是爭取收視率，取得領導品牌地位，訂立在場域內主宰的角色，得以與廣告主有較大的議價空間。

除此之外，台灣環境報禁解除、有線電視頻道開放後，外界對於場域內的掌控權利也從政治控制轉向為市場控制，「收視率」正是市場實踐控制權力的最佳運作工具（陶芳芳，1999）。然而媒體本身卻也與「收視率」共謀，藉著長期監控、互相競爭、互相合作、學習模仿，記取同業失敗或成功之教訓（林韋任，2003: 40）...，種種行動，使得「收視率」成了場域間的共同標尺，於是追逐「收視率」形成一套以市場導向為根基的新聞判斷標準，也造就了電子媒體「一窩蜂」的心態。「市場導向新聞學」由McManus（1994）提出，其中心概念便是市場，傳統對於新聞的定義成為「外顯性商品」而非公器，原本新聞專業意理強調的「社會責任」，反而成為枝微末節。

長期監控，互相學習、模仿、競爭合作，對新聞採訪造成什麼影響？近年來，電視新聞記者習於從報紙、或同業尋找新聞線索，外加時間壓力，忽略查證的重要性，造成一家錯、家家錯的現象。⁴「比報」、「監看他台新聞」這種潛藏著「漏新聞」的恐懼思維，便是「一窩蜂現象」的具體方式之一。

第三節、研究宗旨與目的：記者都瘋（蜂）了嗎？為何不抵抗呢？

本研究目的之一，探討記者本身是否能自省，進而抵抗。那麼，到底要抵抗什麼呢？抵抗盲從跟隨、抵抗同業間不正常的互動（競合）關係、抵抗新聞趨向同質與貧瘠化。當然，這裡所指的抵抗，並非存在主義者所認為的，記者應獨善

⁴ 目擊者編輯部（2006年5月）於文章-「媒體動私刑，徐姓大學生被判十年？」中寫到關於電視台的跟報現象：平面記者常常一大早接到電視台記者電話，一開口就是：『x x x案有沒有某某人的地址、電話？』電視台記者不是看了新聞之後，去檢院方找起訴書、判決書做功課，而是拿著影印本新聞，直接殺到當事人面前採訪...。」

其身，以直接、粗暴的形式對抗「一窩蜂」的壓力源，或如同脫疆野馬不受任何人或團體之約束（Merril, 1996 / 周金福譯，2003），或者走極端路線「隨波逐流或溺斃於醬缸」（馮建三，2006年4月），而是在集體生存、合作的環境下，個人仍然不泯滅自身良心（自我覺醒），應用間接、柔順之迂迴抵抗方式（陳曉宜，2005），「隨遇而安」的生存於媒體場域裡呢？

早在1955年，Breed即提出五種突破組織桎梏的情境，⁵ 近年來更有陳順孝（2003）提出面對不同壓力源的抵制策略，⁶ 亦有張文強（2002）針對記者在面對組織內部權力運作時，抵抗的方式，⁷ 但所探討皆以報業為對象，並未能為「在壓縮時間下，遊走於理性與非理性邊緣所導致一窩蜂現象」解套，因此為本研究的目的之二，在於為此提出抵抗策略。

本研究更將焦點集中在與同業的互動上，原因在於過去的守門人研究，多數著重在「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如Gieber與Johnson（1961）歸納出記者與消息來源存在著對立、合作、同化三種關係，Gans（轉引自李金銓，1981）也以舞會中的男男女女來形容兩者間的關係；在台灣，臧國仁（1999）的研究發現，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互動頻繁。然而，探討新聞同業間的關係卻不多；新聞場域記者的生存之道，比外界的單純想像來得更加複雜，尤其在商業機制運作下，記者與同業間的互動關係，甚至高於消息來源；因此，探索記者與同業間的緊密互動與新聞同質化之關係脈絡，為本研究目的之三。

此外，新聞場域所存在的「極端同質性」（Bourdieu, 1994 / 林志明譯，2002），讓新聞從業人員易於「橫向發展」，也就是與友台同線記者的聯繫、交流以及互通有無、尋找線索下，因而產出類似的「新聞」，僅存播報順序之差異。因此，記者的「跳槽率」比一般企業公司大很多，他們只要建立起與同業間、消息來源間的情感，由於新聞操作方式雷同，不管進入哪間公司的新聞部，都很容易上手；總言之，「一窩蜂現象」下，對於新聞場域與記者有何影響，為本研究目的之四。

綜上所述，可從記者在場域中採訪重大社會新聞事件時的產製過程，瞭解「記者內在心理動機」，首先是記者與公司內部「主管」、「同事」之交集，如何影響記者採訪方式與思考脈絡，其二是在採訪過程中與「同業」的競爭合作，記者一窩蜂跟進的狀態。除了從記者角度去探討一窩蜂的來龍去脈外，下一步更應探討一窩蜂現象的所帶來的利弊得失，總結以上，回到記者本身，思考記者能不能抵抗？要不要抵抗？如何抵抗？

⁵ 1.政策規範不明顯；2.主管不瞭解新聞事件細節；3.記者「佈局」請他家報社先出稿；4.記者主動挖掘新聞線索；5.身為「明星」記者（轉引自李金銓，1981: 37）。

⁶ 參見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台北：五南。

⁷ 參見張文強（2002）。〈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的權力控制與反抗〉，《新聞學研究》，73: 29-61。

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 一、 探討在重大事件採訪過程中，記者一窩蜂跟進的來龍去脈。
- 二、 瞭解在新聞產製過程中，記者與決策者、同事與同業之互動情形，從中剖析「一窩蜂現象」中，記者的心理動機與運作過程。
- 三、 探討「一窩蜂現象」後，記者與新聞場域的利弊得失。
- 四、 歸納記者在「一窩蜂現象」下，能否有抵抗的空間與可能性。